

李大兴 著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 李大兴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 [美] 李大兴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9

ISBN 978-7-108-05979-6

I. ①在… II. ①李…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271号

- | | |
|------|-----------------------------------|
| 策 划 | 知行文化 |
| 特约编辑 | 江山美 |
| 责任编辑 | 朱利国 |
| 装帧设计 | 陶建胜 |
| 责任印制 | 张雅丽 |
| 出版发行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
| 网 址 | www.sdxjpc.com |
| 邮 编 | 100010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3.75 |
| 字 数 | 165千字 23幅图 |
| 印 数 | 00,001—10,000册 |
| 定 价 | 38.00元 |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二〇一六年六月间，大兴来亦庄小叙。饭间，我问他写文章何以那么快捷，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篇美文见报？他说，专栏文章时限固定，按期交稿，需事先打好腹稿，然后以语音输入手机，稍做修改后即发往报社；一篇千字上下的短文乃至三五千字的长文，从腹稿、口述、改定到发出，只需两三天即可完成；实则一生亲历之事，心中积郁已久，酝酿成文，井喷而出，乃一大快事也。

李新师、于川师母家四兄弟，大兴行四。长兄小丁健谈，次兄小兵少言，三兄小明爱唱。三人在京，虽不常见，却时有音问。大兴二十岁时由北京大学保送日本留学，自那以后，只是从李新师和于川师母处知道大兴的零星信息。直到二〇〇五年李新师远行后，才在小兵的办公处与大兴以及他的三位兄长匆匆相会。又过了十年，这一次大兴回国长住，总算有时间聚谈，并诵读他的书稿。

大兴生于一九六〇年，是国人饱受挨饿之苦的大饥荒年代。我于一九六二年春从长春来到北京，每饭面对的只有黑面火烧、盐炒泡黄豆和无油青菜汤。初见大兴是他一岁多，高度营养不良时。每逢他发高烧，我就抱他到宽街北京中医医院就诊，拿药后再送他回位于铁狮子胡同的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师家。这样的急诊不少，多半由李义彬兄一人为之，我偶尔也帮忙。大兴儿时患轻度软骨病，自云身形就像一根长竹竿顶着一个大西瓜，摇摆不稳，弱不禁风。时逢“文革”，他小学、初中似乎都未读，却到处找书，广泛涉猎，读到许多当年别人很少看到的禁书。历史上不少读书人的杂学博识，恰恰是在文字狱中修炼成的。“文革”毁书无数，却无法把书完全毁掉，这是倡言反智毁书者所始料不及的。毁书者之恶，绝甚于秦始皇焚坑之恶。其恶铭于人心，

刻于史册，永为后世诅咒，乃历史对邪恶的严正惩罚。

大兴七岁失学，开始无票乘坐十三路公共汽车，三年后持小明的学生月票，坐遍京城公交车，从市区到郊区，几十条线路，全能背出站名；十岁学会记账、做饭、为母亲熬中药；十五岁起吸烟饮酒，却是个爱读书，爱做梦，不打架，不合群，喜做单相思，内心羞涩的好孩子。基本没有受到主流教化的熏染，也缺少社会潜在意识的浸淫。小学一年级辍学，在家受母教读书的同时，先习写古诗，再试写新诗和随感（于川师母给我看过），似乎一直陶醉在诗歌与音乐中。十七岁重返学校课堂，三年后（一九八〇年）以北京市文科高考第二名进入北京大学，半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一九八九年后，离日赴美，长期做公司职员；一年前辞职，重回文学与音乐之旅。

一个人遭逢或目睹不幸与磨难的逆境（诸如“十年浩劫”中的批斗、抄家、自杀、武斗、杀人等恐怖惨状，使人无时不在恐惧与无助中），定会丰富人生阅历，使自己变得坚毅聪慧，逐渐找到自我，找到审美和思想的路向。大兴半生经历可为一证。

大兴的书，多为阅世、阅人与阅读的人生自述，视野广阔，思虑深远，涵盖文学、史学、美学、诗学与音乐；时而平实晓畅，时而诗意充盈，新奇驳杂、舒展有致的文风，离不开家庭，特别是父慈母爱、兄长之情的滋养，可谓集父母兄长智慧于一身。

大兴写母亲于川的文字尤其感人。正是母亲以其深情大爱，保全呵护了大兴的聪慧好学、自由不羁、浪漫与谨严交融的独特性格和才华，他才得以在知天命之年，井喷式书写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人事书事——这人生一幕，随后还会有青年、中年……一系列个人历史回顾会接踵而来。以他写作速度的快捷，我相信很快便会看到第二幕、第三幕的精彩展现。大兴说：“历史应该是个人书写。”我赞同，我欣赏，这是因为个人书写是家国书写的浓缩版，个人的微观史是时代宏观史的真实映照，肃清历史虚无论当由此做起。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于海南五指山

陈铁健 八十又二

目 录

序 陈铁健 1

前 言 1

童年·少年

红楼月照儿时梦 5

那张带星星的火车票 15

多少风云逝忘川 22

北师大附中初三八班 31

难忘的一九七九 38

准备高考那一年 45

一九八〇年的北京大学 53

在行走中况味昨日和今天 61

父亲·母亲

张力与怀念 73

歧路与和解 81

往事几无痕 91

华年一梦间 99

花落花开水自流——于氏家族史一瞥 105

没有“母亲节”的那些时光 112

人事·书事

- 回忆早年的王小波 121
- 一片冰心在玉壶——忆陈旭麓先生 132
- 被光阴掩埋的背影 140
- 当时俊彦竟蹉跎 146
- 末代王孙无人识 153
- 曾记纷飞冰雪时 160
- 七号大院的《流浪者之歌》 166
- 蓝色的多瑙河深又长 174
- 诗的年代在远方 183
- 永远的日瓦戈 189
-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196
- 廿年重识张爱玲 204

前言

这部小书里主要收集了二〇一六年五月以来我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开的“个人记忆”专栏文章和散见于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统共二十五篇，分“童年·少年”、“父亲·母亲”、“人事·书事”三部分，分别记录了我出国留学前的一些时光、关于父母的片断回忆、家族历史的一瞥、难忘的人以及难忘的书。

半个世纪之前的张自忠路（如今是平安大街的一部分）还是一条窄窄的林荫道，汽车稀少，来辆公共汽车都能让五岁的我兴奋半天。人民大学大院几百户人家电视不会超过五台，看上一场电影哪怕是纪录片也会被念叨回味许久。我一记事就像《铁皮鼓》的那个孩子一样见证了一个混乱荒谬的年代，从小学一年级起就阴差阳错地辍学在家，独自稀里糊涂地长成少年。我本性合群，却没有群可入，游离在社会边缘，基本没有受到教化的熏染，也缺乏社会规范在潜意识里的浸透。这段经验深深影响着我的一生：批斗、死亡、游行、打群架植入了恐惧，后来我很想忘却，不料想如今最怀念那段节奏缓慢、自由自在、漫无目的的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七年，我终于回到了学校。三年后的夏天，我以北京市高考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出国留学，开始一出戏的下一幕。

先父十七岁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任重庆学联主席，第二年被学校开除后，参加了共产党。后来他从党政官员转身成为历史学者，晚年主编《中华民国史》，并曾出版他自己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先母出生官宦世家，就读于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后来却和父

亲走到了一起。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经历与家世，然而他们很少提起，直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有待厘清，关于他们的回忆也是一个追溯与确认的过程。

父母广交游，家中朋友常来常往，性格、年龄、背景各异，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我虽然远离同龄人的小社会，却因此旁观大人的世界。虽然生活的底色琐碎无聊，总有些精彩的人、令人感慨的事情，点缀在光阴的念珠上。我原是快乐浅薄的，却因为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只好逮着什么读什么，从《赤脚医生手册》到《人·岁月·生活》，半懂不懂，于是皱着眉毛，仿佛深沉，实则只是缺少童年。十分幸运的是，在没有书可读的年代，我居然因为种种机缘而接触到了许多当时很少有人能读到的书。一些人、一些书，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悄悄引领了我后来的审美和思想的走向。

感谢三联出版这本小书，在少年时代我随父亲多次拜访范用先生，三联于我是非常高远的出版殿堂，我曾经梦想如果有一天能在这里出书该是多么荣幸！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正在度过微不足道的一生。不过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每一个人也终究在他的时代和所经历的历史之中。我自己的故事以及家族的历史并不重要，我素来缺乏弘扬自己或绍述祖先的愿望。追述时光里些许涓滴的意义，在于个人遭际、先人故事种种或许可以对过往百余年的时空，提供一些感性的、个案的描述。毕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哪怕是仅仅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打捞，也许就会失去。文中故事，涉及健在者，为尊重隐私、名讳等有所改动，尚请读者体谅。

感谢三联副总编常绍民先生，感谢刘刚、李冬君伉俪的支持，感谢知行文化图书工作室，是你们的指导与督促，让我在三联美梦成真。

童年・少年



约四岁时的旧照

红楼月照儿时梦

张自忠路自然是为了纪念殉国抗日名将张自忠而命名的，同时命名的还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那两条路原来的名字，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了，可是还有许多人仍然不说张自忠路，而说铁狮子胡同，可见有的时候传统的力量是很顽强的。到了“文革”时，很多胡同都改成了反帝路、反修路一类名字，张自忠这种“国民党反动派”自然也是要不得的，可是几乎没有人记得当时路名改成什么了。那个疯狂的年代终究也是昙花一现，虽然深深刻进了我的童年。

我出生时，家住张自忠路也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熟悉那个大院的人简称为“铁一号”。这里最早是明末田皇后之父田弘遇的宅第，清末民初时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北洋后期段祺瑞执政时的执政府。一九四九年后，以培养党政干部为任务的人民大学进驻。五十年代中期，人民大学本部迁往西郊林园，原执政府办公楼哥特式建筑西面，盖了三栋红砖宿舍楼。其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哥特式西方资产阶级建筑形式自然不会再用，但这三栋楼也不是苏联式样，除了厚大笨重庶几近之外，更多是国产土碉堡的样子，全无美感可言。这三栋楼因其颜色被命名为红一到红三楼，每栋楼有五个单元却被命名为甲到戊组，而不是一到五单元。这种称呼在北京极其罕见，不知道是不是从解放区带进城的革命话语之一部。楼呈宝盖形，乙、丙、丁组居中，甲、戊组分别拐过来各占一头。楼有五层，楼顶是一巨大平台，用一米二



约八岁时的旧照

左右的墙围起，每逢“五一”“十一”，是看烟花的绝好地点。那时人头攒动，欢声起伏，是童年难得的明亮瞬间。

楼顶平台的最大好处是各单元之间可以从楼顶来往，对小孩玩捉迷藏、大人进行“反革命串联”、小偷作案都很方便。我七八岁的时候有时自己去楼顶看星星，曾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回家晚了被狠狠训了一顿。不过“文革”时家长绝大多数不是忙着革命就是被革命，无暇顾及管教子女，我们就像荒草一样慢慢长大。执政府的大花园那时也是一片荒芜，喷泉早已干涸，野草丛生，小径长满青苔，路灯碎灭，入夜一片黝黑。岂止花园，由于维修工人们也起来造反，楼道里的灯没有人管，多半熄灭了。我从小就习惯在黑暗中上下楼，偶尔会一脚踹到邻居堆在楼道中拐弯处的冬储白菜。如今我也经常半夜起床走来走去从来不用开灯，曾经写下诗句，“在梦里充满黑夜／在墓场

坐到天明”，其实都来自亲身体验。

在口号是“人多力量大”，根本没有计划生育的六十年代，虽然死人多，生得更多。大院里面小孩众多，一玩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贼”就以四五十计。有一次我藏到执政府大楼堆杂物的顶楼上，忽然站起一对青年男女，把我吓得半死，而他们更是仓皇而逃。若干年后，我明白了其中就里，也理解了他们的慌张。“男女关系问题”虽然不如“反革命”罪那么致命，也足以让人名声扫地、万劫不复。

在某次被“官兵”追得慌不择路时，我一跤前仆，两颗门牙飞出，满脸是血。幸亏是还没换的牙，不过据说我后来门牙长歪和这一跤还是有关系的。无论如何，从此我不再被准许晚上出去玩。家里有一套残缺不全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小人书，大概是六十册里的十多本吧，我十分喜欢并且经常照猫画虎画打仗的小人。父亲自一九六七年一直在“牛棚”被“学习”，不过还算幸运，每天可以回家。晚上从学习班回来，他就给我读小人书，后来明白那也是他安慰自己的一种方法。他读了若干遍后，我就把这些小人书背下来了。不知不觉地我看着字形就能知道怎么念，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识了字，识的字多了，就改自己读字书了。家里书柜抄家时被贴了封条，风声尚紧，也不敢偷偷打开。所以我一开始读的是各种“文革”里的小报，还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到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召开，我已经可以囫圇吞枣地读大会公报了。

一九六八年秋天，“文革”告一段落，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上了北京府学胡同第一小学，班主任翟老师，三十出头，身材不高，常带笑容，和蔼可亲。开学第一课是学读和写“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当时还不会右手写字，但不用老师教就左手写了出来。

我出生在大饥荒年代，从小营养不良，缺钙性软骨，两岁半才会走路，此后也根基不稳，一推一跟头。不过估计是饿死鬼来投生，七八岁时的饭量已经顶得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所以我个子一点也不

小，脑袋硕大，已经戴四十号帽子了。因此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那是一间不知为何偌大的教室，后半间都是空的。我听课感觉无聊，时常望着窗外。然而窗外只有一片灰瓦屋顶，不像十年以后上高中时，可以看见全聚德烤鸭店走廊，服务员端着烤鸭走过，我远远地咽口水。

望着窗外也不好玩，于是我在上课中站起来，在教室的后半间踱步一会儿再坐下，翟老师和同学们看着我目瞪口呆。课间小朋友们三两成群地下楼玩，我却自顾自在座位上画古装小人骑马打仗。从七八岁时画十八般兵器，到十二三岁时改画高鼻梁大眼睛半裸美女，作为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倒也十分自然。

家兄那一学期也转入府学胡同第一小学读五年级，聪明机灵，极得班主任喜爱。然而没过两个月，班主任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学校要求学生“划清界限”，对他揭发批判。家母坚守学生不可以批判老师的原则，去学校交涉未果，只有让家兄休学。恰好翟老师也即将临盆，需要请别人代课一段时间。她向母亲建议说，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现在又没有哥哥罩着，不如也休学一段时间。于是我也离开，再回学校，是八年多以后。

二

九十年代中期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也曾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度过童年。我和他谈起往事，他却告诉我那段时光不堪回首，他大半记不得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自己也曾经想要忘却，走出往日的阴影，许多记忆也就真的渐渐远去，徒增几分过往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位教授从楼顶平台上一跃而下，当场死亡，大人和孩子纷纷奔跑过来围观。我也朝现场跑过去，但是马上就被抓回家了。我至今不能确定，有没有看到脑浆迸溅的死者，但是四十多年来，这个场景会情节变幻，偶然出现在梦中。

一九八二年我看电影《铁皮鼓》时热泪盈眶，其实与电影本身倒

没有太大关系，更多是一种相通的感动、一种我曾经梦想过的拒绝方式。死亡与暴力足以在瞬间摧毁童年，并以某种延续影响人的一生。如果你是一个被害者，那么你会经历一个受创与平复的过程；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么你看到的景象或许会留存更久。在刻意或者不经意之间，童年体验对生活态度和有关我们所处时代的认知，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也许你读过卡夫卡，不知你是否发现，如果你想要走出去，你就永远走不出城堡。卡夫卡自己也是如此：生前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终生未婚，但是不断地恋爱、订婚、写情书，临终时深感绝望，想把《城堡》付之一炬。我们无法走出的何止城堡！虽然在时间的河流里，我们的一生和我们的时代无非过眼烟云，我们却不论在哪里也毕竟不能走出历史。红一校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依然矗立在那里，老迈不堪。我想起蜂窝煤炉的火光，冬夜我经常坐在炉边读书。书中历史人物的故事，遥远而有趣。那时自然不曾想到，若干年后许多见过的人就成了历史中人物，一点不遥远，也未必有趣。

人民大学是党办学校，红色大学自然知识分子也是红色的，然而仔细看去，色彩其实十分复杂。像苏斯洛夫、张春桥那样冷酷无情但好像自奉颇谨的意识形态木乃伊毕竟极其少见，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外表，其实经常是一种处世之道，大多数人依然是千篇一律的蓝制服下的百色人等。

北大历史系郝斌先生回忆录《流水何曾洗是非》中记述，一九六六年历史系三院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副对联被伟大领袖知道了，改为“池深王八多”。铁狮子胡同一号虽然池子浅得多，“王八”却也不少。郝斌先生描写的批斗会情景，我不满六岁时就从二楼家里目睹在窗户下进行的全部过程。那一对夫妇是那个年代罕见的胖子，以两人加起来超过四百斤闻名。我看见他们跪在单元门口，每个人背上再踩上一只脚。阵阵口号声怒吼轰鸣两小时后，数百人群散去，他们真的是站不起来了，手脚并用爬上台阶，消失在门里。宗生女士死于“文革”中，何务双先生“文革”后调外

交学院任副院长。一九八〇年外交学院招我作为保送生入学，我去何先生家了解情况，他又恢复了老干部的官气。

红楼岁月里，父亲和一位鹤发童颜、红光满面、声音洪亮的老先生时有往还。如今大多数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文革”后发现他原来是金日成的老师。尚钺先生曾是左翼作家、鲁迅弟子、二十年代的地下党，但是后来和鲁迅分歧，被党开除，转教历史，直到抗战后才重新入党并被派入民盟。在五十年代热闹一时的古代史社会分期论争中，尚钺先生因主张“魏晋封建论”遭到批判，“文革”中更是丧妻失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老先生健康开朗，他和父亲都极健谈，一见面就说得热闹。

“文革”中，他的妻子阮季女士自杀。阮季女士是母亲燕京校友，也在历史系任教，本不必死，但好像年轻时精神曾经受创，又在“文革”里被批斗，不堪折磨而逝。身后留下三个孩子，幼女才七岁。大约一两年后，尚钺先生走出哀痛，和一位詹女士结成连理。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婚礼，也就是门口贴上“囍”字，屋里人来人往，吃到了平常难得一见的奶油糖而已。听到大人们私下讲，尚钺先生是第四次结婚了。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人可以结不止一次婚。不久后读“文革”小报揭发刘少奇“生活糜烂”，有过五个老婆，可转念一想，毛主席好像也结了三次婚呀！

尚钺先生的小女儿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还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圆脸，白白胖胖，很可爱的样子。不过我很快辍学，再听说她的消息，是十一年后知道她考上北大生物系。又过了十几年，在校友会遇到一位历史系师兄，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参加过若干次聚会后，有一天他忽然提到他夫人也是北大的，名字是尚京子。以现在的流行语说，我当场石化了。此时他们阖家即将迁往麻省，我匆匆见到小学同学一面，自然是彼此都看不到一点童年痕迹。